

姜景奎专栏

《火河》中的文明史观及其呈现策略^①

张亚冰

摘要：基于虚构文学具有的现实唤起和指涉功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往往能够成为研究社会、历史的重要途径。古拉杜勒恩·海德尔的乌尔都语长篇小说《火河》是一部内容庞杂、结构宏大的历史题材虚构作品，重点关注了印巴分治的历史进程。不同于分治文学中常见的集中展现分治伤痕的叙事方式，《火河》将分治时期的社会与文化拉入印度次大陆跨越2500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之中，从公元前四世纪古代印度的思辨时代到15世纪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建共生的文化社会，从西方殖民者带来的重大社会变革到分治前后的激变时刻，全面呈现了印度历史文明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上印度文明的复合特性。通过关键人物在特设的四个历史场景中的不断重现，结合对历史时间地点等相应细节的积极选择和呈现，作者有效结合了历史书写与虚构叙事极力追忆、重现历史上印度社会拥有的以多人种、多文化、多宗教等为代表的多元复合文明，表现了历史中长期的“共存”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下的“分离”之间的关联和冲突，以此关涉印巴分治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展现了作者的文明史观。

关键词：《火河》；历史书写；古拉杜勒恩·海德尔；文明史观；印度文化

收稿日期：2022-03-20

作者简介：张亚冰（1983-），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乌尔都语言文学，南亚文化。

就历史书写和虚构叙事的关系而言，人类早期的历史书写基于与神话的紧密联系，是带有虚构性的。随着认知的不断发展，历史书写逐渐与虚构性叙事泾渭分明。虽然历史所需要的基础事实决定了其线性和客观的特质，这与虚构性质迥异，但与虚构叙事结合后可成为文学创作在类比基础上实现现实唤起与指涉功能的积极辅助。作家将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安排进历史的真实细节中，提升了戏剧冲突的可信度，在虚实之间唤起读者对真实世界的思考与判断，乃至产生影响。乌尔都语长篇小说《火河》（*Aag Ka Darya*, 1959）正是这样一部历史题材虚构作品。因其复

^① 本文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王靖的帮助，特表感谢。

杂的内容与庞大的结构，被巴基斯坦著名作家、评论家拉希德·阿姆吉德（Rashid Amjad）称为是一部印度次大陆的文明史，真实展示了次大陆文化的各个层面在不同时代中的兴衰。小说创作于1956年8月至1957年12月，其间作者古拉杜勒恩·海德（Qurratulain Hyder，1926-2007）一直生活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极大反响和巨大争议，被翻译为包括印地语在内的14种印度官方语言。1998年由作者本人翻译的英文版《火河》（*River of Fire*）出版，小说由此被推进更为广阔的世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受众和学者的关注，被誉为印度次大陆的《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火河》的英文版与乌尔都语版本差别较大^①，但得益于其问世，印度、巴基斯坦和北美的诸多学者以英文版本为基础进行了包括从女性主义、历史视角、翻译传播等角度的解读和评论。事实上，相较于英文版本，乌尔都语版本使用更丰富的事例，深入充分地阐释了印度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多族群、多宗教文化混杂的多元复合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塑造更为全面深入。然受限于《火河》乌尔都语文本宏大的结构、较长的篇幅和繁杂的内容，阅读难度较大，学界对乌尔都语文本的研究不足。本文主要依据《火河》的乌尔都语版本，通过其中历史书写与虚构叙事的具体架设，解读作品内核，即作者通过对印度长达2500年社会历史进程的一步步呈现，试图表现出的对印度文明、历史的态度。

一、历史书写与虚构叙事的基本架构

历史书写一方面表现在真实的历史背景，包括时间、重要事件和社会特征等；另一方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虚构叙事则体现在虚构的人物和个人生活上。《火河》中虚构人物在真实历史背景中经历着虚构的个人生活，同时展现出真实的社会文化细节。这种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再现性的，也可能是例释性的”^②，也就是说，通过历史书写与虚构叙事的不同架构，可以直接呈现现实，也可以通过照应策略，获得具有象征意义的深远效果。从情节和历史背景的架构来看，《火河》的情节建立在印度次大陆近2500年的历史背景中，从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和蓬勃发展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后不久，主要按历史时间顺序线性发展，但并非平铺直叙。作者选择了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个历史时期作为情节的必要背景。

^① 《火河》的英文版与乌尔都语版本差别较大，内容有明显的删减与改写。如删除了开篇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诗集《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诗歌《干燥的萨尔维吉斯》（*The Dry Salvages*）的乌尔都语改编节译；每个章节除标号外起了章节名，章节数由乌尔都语版的101章（由于标记问题，实为100章）缩减为73章等。英文版《火河》可被认为是海德针对印度本土和世界英语读者的认知做出的相应调整，也是其增加了近40年阅历后的再创作。

^② 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著，于雷译：《叙事的本质》，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第一个时期是旃陀罗笈多·毛里亚（Chandragupta Maurya）统治下公元前四世纪的孔雀帝国时期；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德里苏丹国最后一个帝国洛蒂帝国（Lodhi）的陷落和莫卧儿帝国建立；第三个时期大致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统治到英女皇全面接管印度之后；第四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到50年代，即印度追求民族独立和印巴分治前后，这一部分是整部小说的重点，占据了近三分之二篇幅。这四个时期在印度历史上极有代表性，几乎浓缩了印度历史、社会和宗教文化的重要阶段。作者用前三个时期铺垫了印度的多元复合文化内核，并在第四个时期通过展现20世纪上半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展现了现代民族国家诉求与印度多元复合文化之间的割裂和冲突。

在四个历史时期中，作者用虚构人物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细节，包括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的有效互动，展现历史叙事中鲜活的人生。《火河》中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的交集不仅表现在印度历史上的帝王皇权之争，也表现在近现代政治运动和民族运动及其思潮中，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频频交往，亲历了诸多重要事件。

生活在15世纪的波斯阿拉伯人后裔卡玛勒（Kamal）^①来到印度后，基于对历史、文化、语言的浓厚兴趣，习得梵语，掌握了俗语，记录了北印度社会人文和历史，展示了15世纪的印度乃至世界历史的横截面。卡玛勒首先来到巴卢勒·洛蒂（Bahlol Lodhi）统治下的德里，后为体验新的文化中心，前往苏丹侯赛因·沙（Hussain Shah）治下的江普尔（Jaunpur），在其宫廷任职，为热爱印度古典音乐的苏丹寻觅古代梵语乐谱。1486年江普尔苏丹国被德里苏丹洛蒂王国吞并后，卡玛勒受到战乱的打击，经人指引前去面见格比尔达斯（Kabir Das）并聆听其教诲，认识到“爱”是超越宗教的存在，“卡玛勒想，即便宗教在人生中真的如此重要，但显而易见，爱是比宗教更为高级的东西。爱是真实的”。^②他发现大多数神秘主义者，无论印度教徒或穆斯林，婆罗门还是裁缝、纺织工等低种姓者，都在追求平等，追求神爱和人爱的统一，希求不同教派和平相处。小说中还提到印度次大陆首位女性穆斯林统治者德里苏丹国奴隶王朝的拉齐娅苏丹（Sultana Razia）。历史上她临危继位，身着男装处理朝政，骁勇善战，却遭到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强烈反对。小说通过一个牧童的描述侧面呼应了这一史实。牧童告诉卡玛勒，拉齐娅苏丹被暗杀的原因可能是她计划减免印度教徒的人头税，同时还提到拉齐娅苏丹在位时发行的货币，一面为其名号，另一面是吉祥天女的图像。

由此，作者通过虚构人物卡玛勒在印度的游历，将史实与文学虚构进行了呼应和相互例证。通过卡玛勒的游历，读者重温了15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史。彼时全球硝

^① 卡玛勒（Kamal）是卡玛勒丁（Kamaluddin）名字的简称。

^② Qurratulain Hyder, *Aag Ka Darya*, Lahor: Sang-e-Meel Publications, 2007, p.128.

烟四起，西亚、欧洲到处是流血和屠杀。读者跟随着卡玛勒的步伐，观察和思考鞑靼人的入侵、“十字军东征”等历史事件对人类几个世纪文明发展的摧毁；小说中也提及基督教在西方的崛起，预示着穆斯林或将失去西班牙和印度的巨大财富；又提及印度在原料和商业方面的巨大潜力，暗示着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侵略的到来等。卡玛勒的游历再现了穆斯林世界的昨日辉煌和已经可以察觉的停滞与绝望，预示着一种新秩序即将甚嚣尘上。

通过在文本中创建历史书写与虚构叙事的基本架构，海德尔在被视为真相的历史和被视为虚构和想象的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凭借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间的交流表现出的诸多历史细节为小说的虚构叙事增添了真实感，虚构人物的行为有所依托，情节发展有所参照，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张力。

二、历史书写与虚构叙事的互动策略

历史是真实事件的记录，和文学一样都是被叙述的。历史事件无法改变，但叙述的态度和角度是可以选择的。即使涵盖相同事件，使用相同事实，历史的记述者可以采取强调、弱化等技巧决定事件呈现的角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塑造事件的性质。文学作品可供叙述者选择的方式更为灵活。小说家可以通过叙事顺序、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语言使用等方式，来调整时间，操纵事件的性质，引导事件的走向和读者的思考角度。《火河》中海德尔如历史学家一般，从大量史料中选择需要呈现的内容，主要通过历史场景的取舍与搭建、主要人物的重现与变化、主要情节发生地点的选择等方式呈现希望表达的文本态度。

（一）历史场景的取舍与搭建

通过小说发展脉络中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选取，海德尔搭建出四个历史场景。第一个场景主要表现了前伊斯兰时期古代印度繁荣和谐的学术景象。自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婆罗门教由于规则繁杂、仪轨复杂开始衰落，16国时期印度兴起“沙门思潮”，出现对“吠陀”的多种解释，佛教蓬勃发展。虽然不时有战争发生，但从文化领域来讲这是一个本土文化丰富、多种宗教文化共存的思辨时期。第二个场景描述了伊斯兰教进入印度，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等多个种族占领并统治了印度中北部地区，对印度本土文化产生了冲击，同时亦有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存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第三个场景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到来，为印度社会带来了巨变，1857年后社会阶层被重新洗牌，萌生的民族主义受到殖民主义影响，原本多元复合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受到了极大冲击，印度人民逐渐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同时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又展现出印度文化的影响力，它对长期生活在其中的西方人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第四个场景是印巴分治前后，小说以印度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为主，特别是其中的穆斯林角色，他们在印度长大，又接受了西方的精

英教育，拥有财富和才能的他们本应是印度社会的佼佼者，却难以被分治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完全接纳。其中一些人在分治后回到印度，承受着被熟悉的故土百般质疑、刁难的艰难局面；还有一些干脆选择逃避，定居国外远离矛盾的中心。

这四个场景涵盖了印度历史上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串起了印度历史、文化的一条脉络。四个历史场景并无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主要角色和情节发展，然而四个场景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作者通过对主要人物的特殊处理，建立起不同场景中人物和情节的关联性，并通过他们的串联显示了历史的延续性。

（二）主要人物的重现与变化

《火河》内容涉及的历史跨度达两千多年，其主要人物不可能贯穿始终。海德爾采用了既有延续感又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方式，通过相似或完全相同的姓名在不同时代中重复出现，避免了跨越不同时代中的割裂感，呈现出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变化和规律。以小说三位主人公的姓名为例：

乔达摩·尼拉姆布尔（Gautama Nilambur）是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公元前四世纪，婆罗门乔达摩正在舍卫城（Shravasti，位于今印度北方邦北部）度过梵行期的最后一年。他偶遇曾为皇子的佛教徒哈利香卡（Hari Shankar），与他就哲学和宗教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这些对话表现了年轻的婆罗门乔达摩的疑惑和思考，也为读者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乔达摩成长在多种宗教、政治、文化观念混杂的氛围中，是一位热爱雕塑、绘画艺术的理想主义青年。他反对帝国扩张和侵略，时常质疑战争的意义和参与作战的责任等问题，对婆罗门经典存在一些疑虑。这些正反映了当时婆罗门教日益衰落，多种哲学、宗教思潮异军突起，婆罗门教的一些教义正受到佛教等哲学思想的极大冲击，社会呈现出思想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特色。此时旃陀罗笈多·毛里亚对摩揭陀国发动战争，战争中乔达摩的手指被砍断，无法再进行艺术创作，成为一个流浪的表演者。在第二个历史场景中，身处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卡玛勒在路途中偶遇一位手部残疾的行者，此人曾经代表洛蒂王国与卡玛勒当时效忠的江普尔苏丹国作战，在战斗中失去了手指，暗合了第一个场景中乔达摩手部残疾的特征。后来这个行者在阿逾陀遇到苦苦等待卡玛勒的女子占巴·瓦提（Champa Vati），受她感化扔掉武器不再杀生。在第三个场景中，身处英殖民时期的贫困青年乔达摩·杜特（Gautam Dutt）成为东印度公司派驻印度的代理人西里尔·艾什利（Cyril Ashley）的助手，结识了勒克瑙名妓占巴（Champak/Champa）^①，亲历了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最后成为加尔各答著名的社会改革家。第四个场景中，前一时期乔达摩·杜特的孙子乔达摩·尼拉姆布尔出现在英国大学校园，是一名热爱话剧表演的左翼运动分子，这再次呼应了第一个场景中乔达摩的角色。

^① 二者同义，意为“黄兰/金香木”，做国名和地名时也译为“占婆”等。

占巴是贯穿全篇的重要女性角色名称。第一个场景中她是摩揭陀国大臣之女，在旃陀罗笈多·毛里亚的军队攻打摩揭陀国后，被迫成为华氏城（Pataliputra，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一个老臣的妃子。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占巴·瓦提是一个美丽的婆罗门女子，与穆斯林学者卡玛勒相爱，并决定为他改宗伊斯兰教。外出游历的卡玛勒并未归来，占巴最终孤独离世。英属印度时期占巴化身为勒克瑙的一代名妓，受到良好的诗歌、艺术教育，成为殖民者、印度王公和穆斯林贵族的座上宾，在社会上极有名望。1857年之后，受到殖民者净化运动的冲击，她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财富和名望，在火车站乞讨，无望地等待曾经的倾慕对象乔达摩·杜特的出现。印度寻求独立时期，占巴·艾哈迈德（Champa Ahmed）作为穆斯林律师的女儿在勒克瑙的美国教会女子学校攻读本科学位，申请奖学金前往西方国家留学。求学期间受到卡玛勒富裕的堂兄、英国人、乔达摩等多人爱慕，均无果而终。印巴分治后占巴回到印度，寄住在叔叔家沉闷阴暗的房子里，准备在贝拿勒斯开设律所。

另一重要人物卡玛勒最初以穆斯林学者身份出现在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印度。他在洛蒂宫廷担任翻译工作，与婆罗门女子占巴·瓦提相爱，又因游历离她而去，另外娶妻生子。在莫卧儿帝国胡马雍（Humayun）在位时期，阿富汗人谢尔·汗（Sher Khan）攻打莫卧儿帝国，并以德里为首都建立苏尔王朝。卡玛勒的长子贾拉尔（Jalal）为莫卧儿帝国战亡，卡玛勒受其牵连，被谢尔·沙的士兵囚禁杀害。殖民统治时期，卡玛勒成为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奥德的大地主，长居勒克瑙，生活奢侈浮华，迷恋名妓占巴。他于1856年前往英国，两年后归来发现勒克瑙已是一片废墟，遂迁居加尔各答，多年后其后代又迁回勒克瑙，成为第四个历史场景的主要角色。另一个卡玛勒是贫困、虔诚的穆斯林船夫，受生活所困，在恶劣天气中仍不得不摆渡挣钱。在第四个场景，前一场景中奥德大地主卡玛勒的长孙继承了祖父的名字，在印度和英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印巴分治后回到勒克瑙。作为穆斯林，拥有高学历的他在刚成立的印度找不到工作，家中田地、房产被没收，全家被迫迁往巴基斯坦。

小说中完全相同或近似的人物姓名在不同时代中重复出现，人物的承载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愈加复杂，他们与之前的角色有距离但又有联系，有些是新生角色，有些则是前一时期人物的继承人，还有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同一姓名命名但命运截然不同的双人物设置，这些设置将跨越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串联起来。相似的叙事策略在后来的《百年孤独》中也有呈现，使作品增添了魔幻主义风格和历史、命运的循环感。海德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以同名人物不同的身份和经历、相互之间或与其他人物的交际来表现印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试探、碰撞与融合，促成了印度漫长历史中多个不同时期之间的联动。

（三）情节发生地点的选择

在古印度时期，作者选取了舍卫城、阿逾陀等作为主要情节的发生地。在其余三个历史场景中，人物生活和小说情节主要发生在德里、勒克瑙等地。这些地方并非随机的选择，而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意在表达印度社会的多元复合性。

古印度列国时期的舍卫城和阿逾陀都曾作为位于古印度恒河流域中游的憍萨罗国（Kosala）的都城。书中人物乔达摩生活的时代正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憍萨罗国被佛教的重要发源地摩揭陀国吞并的时期，舍卫城和阿逾陀作为古印度重要哲学思想的交汇和发源地，是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思想碰撞和共存的标志性地点。当时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哲学思想浓厚，对宗教和派别的人为区分相对并不突出，这与佛教、耆那教都源自于印度本土也有一定关系。在舍卫城，小说的重要人物乔达摩和佛教徒哈利就人生的意义、爱情、战争等世界观展开过多次辩论，凸显了当时印度文化中宗教哲学的思辨性和多样性。在提到不同的宗教信仰时，乔达摩还表现出了开放性的态度：

“你是佛教徒？”乔达摩迟疑了一会儿问道。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然后哈利又反问乔达摩说：

“你也是吗？”

“我的想法现在还是开放的。”^①

德里、勒克瑙等地也是重要情节发生地。德里作为苏丹国多年的都城，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地的多个种族汇聚于此。在奥德王国首都勒克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混居，宗教信仰并没有影响人民的共同生活，反而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生活习惯和信仰规则。作者在文本中描绘了勒克瑙文化的融合特性。对于下层最普通的农民而言：

这里没人感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敌对，因为城堡里的地主老爷和宫廷里的土邦王公被封建制度牢固的关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们的租户和佃农既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徒。这些人一样挨打，快乐和痛苦也是一样的。所谓的宗教差异对于这些佃农而言就是些个人问题。穆赫兰月时不要在清真寺前面奏乐；印度教徒哀悼阿舒拉节，穆斯林庆祝燃灯节……离勒克瑙80英里是几千年前被称为舍卫城的地方。这里是圣人马苏德卡兹的圣堂，每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欢快地聚在一起，印历二月一起办集会。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起举着红色的长矛和

^① Qurratulain Hyder, *Aag Ka Darya*, Lahor: Sang-e-Meel Publications, 2007, p.13.

旗帜，敲着小铃鼓从山间走向他的圣地墓园。^①

对王公贵族而言也是如此：“王公夫人每年都从费扎巴德来到勒克瑙庆祝撒红节。全国遍布着印度教国王们让人建造的清真寺和修道堂。”^②一直到近现代，勒克瑙和周边地区一直是印度社会多元复合文化存在的典范，不仅涉及文学、哲学、语言、音乐、着装规范、艺术等重要内容，还包括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等。作者描写了1940年位于奥德的印度——穆斯林中产阶级社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就是卡玛勒等一众主角在印度的故乡。勒克瑙的玫瑰岭（Gulfishan）^③环境优美僻静，家家户户有汽车、电话，父母关注子女的教育，这里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等混居，不同种姓和社会等级的人们各司其职，社会体系稳定。

三、《火河》中呈现的文明史观

（一）文明超越民族（宗教）国家^④

《火河》中，海德尔记述了印度从多元复合文明社会到民族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包括多元复合文明的形成与无奈解体、主权国家的独立和被迫分裂，显露出对印度历史上多元复合文明的崇尚和追思，以及对在殖民主义影响下有所扭曲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批判。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展现的，印度漫长历史上多种族、多宗教之间进行着持续的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之间发生碰撞、交流与融合，各种文化不断重叠，改变着原有的文化形态，融合形成具有多种来源、不同文化特点的多元复合文明，多种文化之间具有共享和共存的关系。这种文化模式形成于印度独特的历史中，各种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是“跨越空间划分的文化实践、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系统的持续存在及相互作用、相互分享和重叠的过程”。^⑤小说中公元前400年前后，婆罗门青年乔达摩对佛教的思想和信仰兴趣满满。他对佛教的规定、佛教徒的义务、前往呾叉始罗（Takshashila/Taxila，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的修行以及佛教的世界观都展现

^① Qurratulain Hyder, *Aag Ka Darya*, Lahor: Sang-e-Meel Publications, 2007, pp.174-175.

^② Ibid.

^③ 意为“玫瑰遍布的地方”。

^④ 在印度独立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受“两个民族理论”影响，此处的“民族”还包含了宗教的概念。19世纪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不断激发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教派矛盾。穆斯林领导人不断认识到英国殖民者一旦离开印度，作为少数派的穆斯林无法和印度教徒平等共存。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穆斯林改革者和领导人先后多次提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为两个民族，要在印度北部建立一个穆斯林的独立国家，这一观念被称为“两个民族理论”，也成为巴基斯坦的建国基础。这一观念主要由穆斯林领导人提出并推广，未被希望实现“大印度”独立的多数印度教领导人和印度教徒所接受，但仍被一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利用，用以推广“穆斯林阴谋论”，最终出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结局。

^⑤ Bipan Chandra, Mahajan Sucheta, eds., *Composite Cultur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2007, p.195.

出强烈的好奇。穆斯林在印度北部建立统治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创造出融合了伊斯兰和印度教文化元素的复合文化。小说中德里苏丹国统治时期，卡玛勒在孟加拉听到说书人、船夫、耍蛇者和捕象者等各式各样的角色唱诵神的赞歌，它包罗万象，毫无宗教壁垒：

“如若没有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赐他平安）/真主的国度无法在三界建立/万岁万岁，先知阿卜杜勒和阿米娜/向麦地那致敬/向所有的圣人和法蒂玛女士致敬……我在沃林达林面前鞠躬/向永恒的主黑天和可爱的罗陀夫人致敬/我对穆斯林的所有教派表示敬意……现在我前行来到了悉多的圣地/我虔诚地跪倒在女性美德的理想面前/还有她的主罗摩/致敬！致敬！致敬！”……卡玛勒惊讶地听着这首颂歌，然后加入到歌唱者的行列齐声高歌起来。^①

这首同时属于真主、先知、印度大神黑天和爱人罗陀、罗摩和悉多的赞歌，是印度文化中多元和复合性的集中表现，表达了对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印度文明的赞颂。在追求民族独立时期，卡玛勒面对愈演愈烈的宗教和民族分裂，将混合了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和英国特征的印度比喻为丰富、混杂的纺织品，经纬线缺一不可，以此质疑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出现的狭隘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

然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作者认为印度从一个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由文化维系的文明社会转变为具有固定疆界的民族国家。殖民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再重视多元复合文化的统一和包容原则，而是扩大宗教的排他性，利用民族和爱国热情人为区分和分化不同群体，造成了多元复合文明的消解，给印度社会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不仅是社会环境、经济地位等硬件的改变，更是人际关系和认知之间的割裂。甚至在国家身份改变之前，也就是在真正的分治之前，新的身份认知已然形成。印巴分治前夕，身为穆斯林的占巴曾被他人嘲弄道：“恭喜啊，你的巴基斯坦终于成立了。”^②事实上，占巴从未拥护过印度的分治。她曾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两个民族理论”和分治理念的不解：“我在贝拿勒斯上学的时候从来没关注过两个民族观念。对我和朋友利拉·帕尔格瓦来说，那儿的街道、庙宇、河岸都是一样的。等长大了才知道，那些庙宇与我无关，因为我的额头上不点吉祥痣，而且我妈妈不是向湿婆祈祷，而是要做礼拜。所以我的宗教是一回事，我的信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本来就是这个国家的一员，那个另外的国家从何而来？”^③由此，在民族国家观念指引下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原本生活在同一街区世世代代的邻居和朋

^① Qurratulain Hyder, *Aag Ka Darya*, Lahor: Sang-e-Meel Publications, 2007, p.140.

^② Ibid., p.334.

^③ Ibid., pp.303-304.

友，因宗教属性被划分归属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甚至不一定出于其本意，而是被人定义和预判而成。这种人为的割裂继而又引发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导致同一个人只因政治结构的变化而被迫改变其自我和他人认知。民族国家概念成为了破坏和谐的工具，而不是人们真实意志的表达。

小说中民族国家概念在印度的失败还表现在那些分治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身上，他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身份曲解与司法暴力。分治后不久卡玛勒回到了勒克瑙，看到了分治的后果，勒克瑙从多元复合文明的中心沦落到破败不堪的境地：

他亲眼看到世界改变了。公园的树烧焦了，到处是枯枝败叶。车库和马厩都成了库房。（据说那些迁往巴基斯坦的先生们留下的东西都拉过来堆进了库房里。）社区中做服务的厨师、司机们都不见了……最后他回到房间，独自躺在床上默默哭泣起来……他是为看到父亲如今的拮据而担心吗？从小到大一直高呼口号反对地主制度，如今地主制度真灭亡了，却带给他们如此巨大的打击。玫瑰岭的人们连饼都吃不上了，这是什么改革？^①

他原本富庶的家庭一贫如洗，新的政治现实也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和抱负：

卡玛勒开始拼命找工作。他有无数的学位，包括剑桥大学等著名的学院……还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实验室工作过。然而他在大学应聘的职务最后给了一个最普通的理学硕士，仅仅因为那个人是印度教徒。

六个月过去了，他在德里四处跑得快疯了。

王公和他说：“找个推荐人吧。”

“只有那些没资质的才用推荐人，我的能力还不够吗。”

“你再这么想也没用。”

现在他只能整天默默地坐在玫瑰岭，或者写信告诫妹妹千万不要回印度……^②

雪上加霜的是，卡玛勒家的房子被宣布为“撤离财产”，在新的印度无家可归。小说中，一直信奉“统一印度”的卡玛勒认识到，穆斯林在独立后的印度毫无前途，不得不移民到巴基斯坦，然而又被其多年好友视为是对印度的一种背叛。而那些坚持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不能随意与巴基斯坦的亲属接触，极有可能被怀疑成间谍或叛徒。

通过卡玛勒等人物的经历，作者记录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在印度的失败。

^① Qurratulain Hyder, *Aag Ka Darya*, Lahor: Sang-e-Meel Publications, 2007, p.497.

^② Ibid., p.498.

她认为从印巴分治和民族独立的过程和结果可以确认，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特别是被殖民主义利用和扭曲下形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分离政策，削弱并破坏了印度文明原有的强大的吸收、融合和重组能力。从印度文明的发展和历史来看，文明本是超越民族（宗教）国家概念、可以跨越领土边界、超越时代的存在，然而印度文明中“共存”的文化核心遭遇“分离”理念的冲击，导致印度社会被迫重组，不仅造成了当下的教派屠杀，更是带来了难以恢复的族群隔阂和社会创伤。究其原因，小说中提到，印度人民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操纵，错误理解了分裂的原因，“不满和骚乱的真正原因是经济问题，是地主和农民的反抗，但是英国政府为了转嫁矛盾把这种不满涂上了教派矛盾的色彩”。^①可见作者认为，造成印度多元复合文明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正是英国殖民主义。

（二）历史与文明的循环与重复

《火河》中对历史的呈现和理解响应了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历史具有普遍性和循环性的本质”的理论。《火河》中主要角色在四个历史背景中的重现和相似经历的重演，凸显出了历史的循环重复性。读者在阅读中，拥有观察《火河》四个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和情节的“上帝视角”，小说的各个场景仿佛设置在剧场中的旋转舞台，读者就是观众，能够看到每一个场景，通晓不同场景中人物的个性和历史细节，并进行比对。通过这种舞台式的场景设置，读者认识到不同场景中人物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得以挖掘之间的联系，探寻小说中显露出的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循环流动性。从古至今，学者、艺术家、历史学家、帝王将相、殖民者、改革家、教师、学生等，无论男女，无论何种信仰，他们都感受到爱和友谊，体验过生命被残害，财富被吞并，生活遭到流放的过程。尤其是战争和权力的变化闯入社会成员的微观生活中，导致人生轨迹被彻底扭转。小说中20世纪的乔达摩无从得知公元前四世纪的乔达摩也因战争经历了爱人离散的痛苦；20世纪的占巴也不可能得知15世纪和18世纪的占巴同样穷其一生也无法等来爱恋的男子。但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无所不知。这种不同历史时期中人物经历的相似性印证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微不足道，他们如历史洪流中的一叶扁舟，命运随波逐流，或各归其所，或顷刻翻覆。

斯宾格勒还提出文明的发展和衰落也是周期性的。他反对将人类历史视为不断前进的直线型叙述模式，认为文化是循环的，会经历新生、繁荣、没落衰亡的过程。由此可知，没有哪种文明会永远领先。从《火河》中可以发现，历史上没有战胜时间的英雄，包括皇室、地主和帝国殖民主义者，包括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或基督教徒，没有谁是永恒的统治者。历史上婆罗门教遭到了佛教和其他沙门思想的强力冲击，印度本土宗教和哲学的拥趸会被伊斯兰教吸引而改变，即便是在殖

^① Qurratulain Hyder, *Aag Ka Darya*, Lahor: Sang-e-Meel Publications, 2007, p.233.

民时期作为先进文化、生产力代表的西方文明，在影响印度社会文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受到印度文明的反作用，并没有成为永远的胜利者。正如小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西里尔·阿什利博士，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受到神秘的东方财富的吸引，孤身来到印度。在印度居住的近40年间，他被印度富有魅力的文明所感染，被同化。他迷恋上勒克瑙的名妓，与当地女子共同生活生育后代，最终坐在印度居所的扶手椅上孤独死去，被葬在印度的一个小型欧洲公墓之中。

《火河》告诉我们，在历史车轮的不断滚动中，历史人物不断更迭，历史事件层出不穷。在历史不断重演的过程中，压迫者与被迫者不断轮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身份不断转换，不变的是对权力的追求和对利益的追逐。今天的帝王，随着一场战争一次侵略，就可能变成阶下囚，甚至命丧黄泉，普通人更是如此。因此作家通过先知先觉的乔达摩提出了自己的思虑。在第一个场景中，当旃陀罗笈多·毛里亚即将攻占舍卫城之时，乔达摩向印度教朋友、佛教徒，以及向自己不断追问战争的意义，质疑战争原因和目的的合理性。整部小说，我们都能听到无数无辜个体相似的痛苦呐喊。此外，情感也是历史循环中永恒的重要主题。纵览作者描绘出的漫长的印度画卷，揪其主线，《火河》本质上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友情和亲情的故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总是循环往复，虽然会因历史发展产生相应的变化，但主线是人与人的相会和分离。这一主线在孔雀王朝、莫卧儿帝国、独立斗争等时期贯穿始终。虽然历史总会不断将它们抹除，但总会不断重生于历史之中。

四、结语

古拉杜勒恩·海德尔在《火河》中极力追忆、力图重构一个拥有多元复合文明、海纳百川的印度社会，这是一个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等各宗教人民共同生活的理想国，而不是分治前后各教派构想的狭隘社会，响应了印度独立前各教派领导人包括甘地、尼赫鲁以及早期的真纳等希望印度统一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海德尔的思想更多是以结果为导向激发出的对印巴分治事实的反思与批判。在亲历了印巴分治中惨绝人寰的宗教屠杀和数以百万计人口流离失所的悲惨现实，承受了独立的喜悦被分治的悲剧无情掩盖的巨大心理落差之后，印度次大陆很多作家表达了对分治现实的批判和对印度辉煌历史文化的追思，但很少有人如海德尔一般追溯如此久远的文化源流，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和丰富的史实来全面呈现印度的多元复合文化传统，深刻批判殖民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对印度文明的伤害，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思考和处理文明和教派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和文化思路。

[责任编辑：李丽]